从“印尼村”现象看华侨农场归难侨的文化再适应[*1]

胡 修 雷

内容提要 “印尼村”是华侨农场的归难侨建立的带有印尼饮食、舞蹈、建筑等风情的聚集区,这些归难侨强调他们旅居在外的文化记忆,形成了侨居地文化在中国传统侨乡的集中展现。这种舍近求远的文化再适应,是国际移民大潮下人们经历社会变动和文化融合过程中衍生出的课题,归难侨们在回国后展现出的异域文化色彩,是文化多元和时代选择的结果,成为侨乡文化的一种特殊标签。

关 键 词 归难侨 华侨农场 印尼村 文化再适应

“印尼村”是一些华侨农场的归难侨[①]建立的汇集有印尼风情的饮食、舞蹈、建筑等村落的统称,这些村落的显著特点是归难侨把他们在侨居国的记忆再现在华侨农场。从文化适应的角度看,国外“一些土生华人从中华文化中找到了新的充满自豪的归属,并试图实现自身的再华化”,[②]但“印尼村”的归难侨回国后的文化再适应并没有回归传统的中华文化,而是强调他们旅居在外的文化记忆。与跨文化适应理论强调个体进入一种新文化后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不同,这种舍近求远的文化再适应,是刻意证明归难侨曾经的旅居身份,还是对曾经熟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惯性延续?返乡文化再适应是国际移民大潮下人们经历社会变动和文化融合过程中衍生出的课题,归难侨们在回国后展现出的异域文化色彩,使“印尼村”现象成为侨乡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

一、研究缘起和相关成果

2014 年到 2015 年初,因撰写《华侨农场史》需要,笔者先后赴广东、海南等地的华侨农场搜集资料,对侨场中归难侨的文化标记印象深刻。特别是海南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印尼村”,归难侨们对印尼文化流露出的偏爱和执著,形成了侨居地文化在中国传统侨乡的集中展现。本文结合中国大陆一些华侨农场的田野调查,查阅政府档案文献,参考相关研究理论和成果,试图从侨居地文化情结的惯性延续、对归难侨的集中安置政策及华侨农场和周边社会的相对隔离、归难侨的自身因素以及来自政府的推动作用等方面探讨这种文化现象的根源。

国外学术界对返乡文化再适应的研究比较早,朔伊茨(Scheutz)在 1944 年研究海外服役士兵归国后的再适应问题时,提出了返乡文化冲击或逆文化冲击的概念。[③] 此后,阶段论和曲线论在文化适应研究中比较受关注,其中葛勒豪(Gullahorn)提出的逆文化冲击模型影响最大,其研究强调

* 本文在第九届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上宣读,得到部分与会学者的意见建议;文中部分资料来源于华侨农场史调研组,一并致谢。

① “归难侨”是官方对归侨、难侨的合称,归侨指回国定居的华侨,难侨指在国外遭受迫害回国的侨胞。国家对归难侨有明确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中规定了国家对待归难侨的政策。

② 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56 页。

③ A. Scheutz, “The Homeco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4(50), pp. 369 – 376.

跨文化适应的心理变化历程,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涉及情感、情绪和心理反应的概念。① 苏斯曼(Sussman)否认文化适应与逆向文化适应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他认为文化再适应会随着归国人员回国后的行为和对母国文化的适应变化而变化。② 相比国外学界在相关理论建构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国内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理论介绍和部分归国群体研究,如跨国移民、留学生和商务人士等的跨文化适应方面,认为人际交流、主观心态和文化程度等因素会产生较大影响,对华侨华人特别是归难侨回国定居后的文化适应关注不多。③

二、华侨农场归难侨概况

中国大陆现有 84 个华侨农场,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云南、江西和吉林七省区。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主要由几部分组成。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 50 年代,华侨农场主要接收了从印尼、马来亚等地回国的爱国青年和学生;60 年代,由于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紧张,华侨农场接收安置了从印尼、缅甸等地回国的归侨;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受中越战争等影响,华侨农场又接收了越南、蒙古等国的归侨。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周边国家局势趋于稳定,回国定居的归难侨大幅减少,华侨农场很少再大规模安置新的归侨了。

1978 年以来中国大陆华侨农场归难侨人数统计表

年代(年)	1978	1983	1988	1993	2001	2006	2012
人数(人)	181773	215410	218082	209486	177263	161915	134146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侨办编各年度华侨农场基本情况统计表制作,内部资料。

1978 年,全国华侨农场共有归难侨 181773 人。随着 1980 年前后中越、中蒙关系紧张,大批华侨华人被迫回国,1983 年时归难侨人数达到一个高峰。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农场的归难侨人数相对稳定,但从 90 年代开始,农场的归难侨人数开始不断减少,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随着人口的自然老化,早期回国的归难侨相继离去,却很少有新的归侨来到农场;二是市场经济逐步推进后,农场原有的归难侨或者迁移到经济发达的城市,或者选择再次出国,导致归难侨人数只降不增。到 2012 年,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人数只剩下 134146 人,比高峰时降低了 38.5%。

地域分布方面,当初在安置归难侨时,由于国家财力、物力和城市资源有限,将大部分华侨农场设置在传统侨乡和边疆地区,因此现在大多数华侨农场分布在传统侨乡地区。在 84 个华侨农场中,广东原有 28 个华侨农场,1988 年海南设省后减少 5 个,现在还有 23 个,广西有 22 个,福建有 17 个,云南有 13 个,江西有 3 个,吉林有 1 个。吉林的扶余华侨农场几乎都是朝鲜归侨,现仅有 350 人,由于拥有丰富的石油等自然资源,其农场已基本公司化。2012 年中国各省区华侨农场归难侨

① J. T. Gullahorn and J. E. Gullahorn, "An Extension of the U-curve Hypothesi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63(19), pp. 33 – 47.

② N. M. Sussman, "The Dynamic Nature of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out Cultural Transition: Why Home is Not So Swee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0(4), pp. 355 – 373.

③ 主要有张晶盈:《华侨农场归侨的认同困惑与政府的归难侨安置政策》,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 年第 1 期;庄怡川:《国外有关归国人员文化再适应研究综述》,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张欣:《归国留学生文化再适应状况调查》,山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来锋:《青田归国华侨再适应问题研究初探》,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李君:《归国文化冲击与再适应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12 年等。

人口分布情况见下表。

2012 年中国大陆各省区华侨农场归难侨人口分布表

省区	广东	广西	福建	云南	海南	江西	吉林	合计
人数(人)	58354	32584	17728	12812	10999	1319	350	134146
百分比(%)	43.5	24.3	13.2	9.6	8.2	1.0	0.3	100

资料来源:国务院侨办编《2012 年华侨农场基本情况统计表》,内部资料。

收入方面,华侨农场归难侨的收入水平和周边村民及社会整体发展情况相比经历过一些变化。当初设置华侨农场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统分管理制度,农场员工基本享受国企工人的福利待遇,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当地村民;而且,广西、云南、江西等偏远地区侨场的归难侨收入还略高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见下表。

部分年份华侨农场人均收入情况统计表(单位:元)

	广东	广西	福建	云南	江西	吉林	海南	平均
1979 年	186	206	167	210	271	234	..	212
1991 年	1020	583	527	660	578	749	454	653
2001 年	3073	1859	3069	2142	1623	2300	1124	2173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侨办编各年度华侨农场基本情况统计表制作,内部资料。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活力的增强,2000 年以后,华侨农场大多数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如周边村民了。如 2001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2366 元,拥有华侨农场省份的当地人均年收入为 3421 元,而全国华侨农场的人均年收入仅为 2173 元,已经远低于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了。[①] 此外,华侨农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大,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福建等地,侨场归难侨的收入比广西、江西、云南等地高出 30% 以上,地域差距明显。华侨农场归难侨与周边村民经济地位的改变以及农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归难侨难以回避的现实。

三、“印尼村”的出现和发展

“印尼村”位于海南琼海市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北部,土地面积约 2000 亩,人口约 400 人,其中归侨侨眷占 90% 以上。从 1960 年至 1978 年间,彬村山华侨农场先后安置了 2600 多名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缅甸和越南等 8 个国家与地区的归侨。其中,“印尼村”在 1960 年集中安置了众多印尼归侨,建队时定名为“良玖队”。1961 年更名为良玖作业区,1963 年农场范围扩大,恢复生产队建制。1974 年 10 月,更名为“国营彬村山农场五队”。现在的官方名称是“琼海市彬村山华侨经济区五队”。

在彬村山华侨农场,来自不同国度的归难侨们生活在这里,多元文化融会交流,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东南亚风情文化。由于印尼归难侨人数较多,印尼风情文化尤为突出。特别是彬村山华侨农场第五生产队,总共安置了 1960 年 5 月从印尼帝纹岛回国的 160 多位归侨。由于是集中安

①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2》和国务院侨办内部统计报告。

置,他们在国外的一些生活习惯一直沿袭到今天,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印尼村”。

“印尼村”的名称源自三个方面。首先,当年这里集中安置了 160 多名印尼归侨,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很好地保持着印尼当地的生活习俗,如用印尼话进行日常交流、烹制印尼饭菜和糕点、擅长印尼歌舞等,周围的老百姓都习惯把五队的村民说成印尼人。其次,原印尼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前中国侨联名誉主席张国基先生,曾于 1990 年为该村挥毫赐墨宝“海南岛印尼村”。张国基先生是海内外侨社的知名人物,“印尼村”的名声也由此传向了海外。再次,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也功不可没,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台、海南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曾在这里录制反映印尼华侨文化的电视节目。因此,“印尼村”的名称就逐渐传开了。

在“印尼村”,印尼风情文化是当地文化的一块瑰宝。农场当局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尽管早期农场条件非常简陋,为了稳定归难侨的思想,使他们安心农场工作,1961 年农场组织了“业余文艺宣传队”,组织归难侨们表演吉他、手风琴、脚踏风琴、口琴、二胡等节目。1981 年场部建起了一个露天影剧场、搭起戏台,铺设石板作为座位,还铺设了一个硬板化篮球场,作为职工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场地。到了 2008 年,农场又投资近 400 万元,建起了一个集娱乐、健身、阅览、会议等多功能的职工俱乐部,以及职工文化广场和一座戏台等配套设施,为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们提供了展示文化才艺的场所。为扩大“印尼村”的影响,2013 年,印尼村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建成,每到晚上,文化广场上就灯火通明,参加健身舞、交谊舞等活动的归难侨人数众多,非常热闹。

由于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们大多是从东南亚回国的,东南亚风情文化是他们扎根当地的文化标签,归难侨们使用的语言、身着的服饰、生活习俗,特别是民俗歌舞、美味饭菜、风味糕点等都较好地保留着侨居国当时、当地的特色。印尼风情文化是东南亚风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场的印尼归难侨人数最多,“印尼村”风情文化集中展现了印尼风情文化中最具魅力的部分。在侨场,“印尼村”风情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语言 印尼帝纹话和印尼巴厘话是“印尼村”人交流的主要语言,是全村通用的语言。虽然在农场各种集会和社交活动中用普通话较多,但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印尼话最多,该村现有人口约 400 人,能听懂印尼语并能用印尼语交流的占 90% 以上。

2. 印尼歌舞 “印尼村”里的人都能歌善舞,每逢重要节日、婚庆活动或者有海外亲人回来探亲,村里的亲朋好友都会聚在一起喝主人泡制的咖啡,品尝精心烤制或者蒸熟的糕点,开心地唱起印尼民歌。有时,印尼归侨及其子女还会高兴地穿起印尼民族服装“沙垄”,随着节拍轻快地跳起印尼舞来,他们跳的舞蹈主要是帝汶民族舞。

3. 印尼糕点 印尼归侨们有午后喝咖啡的习惯,喜欢制作各种印尼糕点,平时家里自制的糕点不断,逢年过节制作的糕点品种就更多了,据说最多时超过 30 种。印尼糕点种类繁多,寓意深刻,造型栩栩如生,有象征日子越过越红火的九层糕,有香脆爽口、郁香四溢的太阳糕,还有生粉烤糕、螺壳糕、松蛋糕等等,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

4. 印尼菜 由于印尼地处热带雨林,温度高,雨水多、风力小,湿度大。独特的气候条件,造成印尼土壤肥沃,植物茂盛,蔬菜种类繁多,甚至温带地区产的蔬菜亦有栽种。印尼菜色香味俱全,十分爽口。用料方面,印尼菜几乎都离不开椰子、辣椒、棕树糖、虾酱、花生、石栗子、阿参酸果以及各种浓烈的香料和葱蒜等,而辣椒更是每一道印尼菜所不可缺少的。品种有“沙爹”(烤肉串)、咖喱鸡、咖喱牛肉、gado gado 并盘(酸甜辣凉菜)、烤鱼、炒木瓜花、炒芭蕉蕾等,菜肴种类繁多,配上金灿灿的黄姜饭,构成了一桌地道的印尼饭菜。

5. 印尼堂 印尼村里的宗教场所,20 世纪 80 年代由印尼华侨华人捐资 12 万元兴建,农场提供土地 2.5 亩,1989 年 10 月落成、开堂。印尼堂建筑面积 320 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500 多位

信众。

6. 缝制木棉褥子 木棉树原产自印尼,长得很高大,归难侨们把木棉树种带回了海南。当木棉树开花结果后,归难侨们就取出果中的棉絮,经太阳晒干后,用来制成褥子、枕头等放在床上。木棉褥子冬暖夏凉,印尼归侨们几乎每家都有。

此外,“印尼村”还有其他一些带有印尼烙印的生活习俗,比如做祷告、顶瓦罐等。这些文化风情是归难侨们原先在印尼生活时所熟悉和擅长的,因此,当他们被动或自愿选择回国后,尽管国内的大环境是他们或者他们的祖辈曾经熟悉的中国饮食和文化,但是他们没有简单地选择回归,而是强调了一种异域文化的存在。那么,这种文化再适应该如何解读呢?

四、“印尼村”的文化解读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印尼村”集中展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积淀,具有很强的地域和习俗特色。尽管服饰、语言和习俗最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而发生改变,是族群认定的外围因素,但其辨识度却很高。“印尼村”的归难侨们把印尼侨居地的民俗带回祖籍国,并将其作为一种特殊标签大力展示,除了通常的怀旧情结外,还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等深层因素。

(一)侨居地文化情节的惯性延续

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指出,人类在生物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①]这种延续是自身对过去的依赖、留恋或者是惯性,在生物学上是一种本能反应。据统计,仅到 1962 年底,全国华侨农场就接待安置了约 60000 名印尼归难侨。[②] 大量从印尼回国的归难侨,为印尼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归难侨的原籍大多数是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和云南等,回国时只会讲祖籍地方言和侨居地语言。习俗认同是传统小社会存在的基础,相似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心理态势、民族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容易在族群内部形成较强的团结感。在印尼村,大部分归难侨是从印尼回来的,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侨居经历,印尼语逐渐成为村民之间沟通交流的主要语言。

归难侨还把在印尼的习惯带到华侨农场,这是他们对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最初主观上并没有刻意为之的想法。社会习俗是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生活在华侨农场的归难侨,无论来自海外哪个国家,也无论原祖籍在何地,在民俗习惯上既继承和保持着中华民族固有的共性民俗,又融入了在海外居住国的一些民俗习惯,尤其是在饮食方面渗透着异域文化习俗,并形成农场归侨的新风俗习惯。印尼、缅甸归侨喜欢吃辣味、咖啡味,越南归侨在春节或者重要活动中喜欢包粽子、做春卷、蒸年糕等。这些从国外带回来的习惯,是归难侨们在长期的出国又回国过程中逐步养成的,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集中安置及与周边社会的相对隔离

20 世纪 60 年代,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大量华侨华人因排华被迫回国,当时政府采取了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排为辅的政策,由政府提供土地、房屋等,把归难侨集中安排在一起发展生产、自食其力。当时广东大约安置了 10.7 万人,云南安置了 3.7 万人,福建安置了 2 万多人,这些人大多被安排到了华侨农场,这种面向农村、集中安置的做法让很多归难侨感到不适应,由于心理落差大,一些人选择离开农场到港澳台地区或者其他国家定居。[③]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留在了华侨农场。

---

①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 10.

② 《中侨委召开国营华侨农场工作会议》,载《资料辑存·侨务工作》,1963 年第 15 辑。

③ 张晶盈:《华侨农场归侨的认同困惑与政府的归难侨安置政策》,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 年第 1 期。

这些留在农场的归难侨,其身上异域文化带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让当时仍处在贫穷阶段的乡村社会的村民们难以接受,因此,他们与周边社会的接触和交往很少,华侨农场几乎处在与周边社会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贫困归侨主要集中在华侨农场,据统计,全国归侨侨眷贫困发生率约为 4.7%,全国归侨贫困发生率达 11.7%,归侨贫困面远高于归侨侨眷群体贫困面。[①] 物质生活方面的贫困,促使部分归侨怀念过去在侨居地的生活,闲暇时间跳印尼舞蹈、做印尼食品等成为他们的主要消遣方式。

华侨农场归侨的文化适应不存在代际延续问题。通常而言,每个华侨农场都设有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的一整套教育体系,归侨们的后代在国内接受的是同其他中小学一样的教材和内容。但是,整个华侨农场的异国文化情怀是弥漫的并且产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在一些华侨农场,民风民俗既传承和保持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特性,也保留着异域民俗。如婚丧嫁娶既有当地的习惯,也保留着侨居国的习俗,特别是有老人去世时,去世老人的儿子不上祭,而女儿、侄女必须上祭。从上祭的挽联样式便可知道谁是女儿,谁是侄儿侄女。

(三)归难侨乐观精神和丰富生活的体现

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地理、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因素,[②]地理和社会因素是客观条件,难以改变;心理层面反映的是人主动适应或调节的能力。印尼村的归难侨要顺应当地的环境并获得适当发展,只能先从心理层面去调节,抱团和群体认同是他们来到华侨农场后的本能反应,这一点和他们的先人或他们自身早年到异国谋生并无不同。但是,华侨农场毕竟是在祖(籍)国,归难侨的再适应又增加了一层阻力。

华侨在国外工作谋生并不容易,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制,他们很难有足够的闲暇时间进行娱乐活动。回国进入华侨农场后,政府提供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虽然有些艰苦,但归难侨们的生活开始安定下来,“仓廪实而知礼节”,在劳作之余,归难侨们开始关注并参与文化活动了。由于与周边社会接触不多、长期远离祖籍地的家乡文化等因素,刚回国的归难侨们更喜欢侨居地的文化。

华侨农场在 60 年代接收大量归侨后,来自印尼的归难侨大都能歌善舞,经常利用空闲时间自娱自乐。每到傍晚,在农场场部、各生产小队晒谷场等地都有归侨们跳交谊舞。后来,农场还成立了业余文艺演出队,经常参加各种节庆演出活动。有时,一个农场能拿出舞蹈、合唱、独唱、演奏等 30 余个节目,极大地丰富了农场职工的生活。

(四)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培育

尽管条件有限,农场文化娱乐活动设施相对滞后,但不少华侨农场都建有文化活动室和文化活动场馆。农场的大型文体活动集中在元旦、春节、三八妇女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表演主要是各种比赛、游园活动等形式。平时,场民的文体活动基本是自发的。由于室内活动场所有限,归侨们更愿意到室外的露天场所锻炼身体。农场领导因势利导,在场民住房外的空隙开辟出了大大小小的活动场所,许多生产小队都组织成立了歌舞表演队,农闲时节,各歌舞表演队都组织歌舞表演,自娱自乐。一些农场和生产队还组织越南的帽子舞节目、风情山歌对唱比赛等。

2007 年后,国家推行华侨农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三融入”政策,大力推进华侨农场体制改革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华侨农场文化建设也进入一个新时期。在国务院侨办等十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工作的意见》中,强调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农场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农场文化市场不断繁荣,农场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完善,有力

① 国务院侨办统计数据,内部资料。

②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9 年,第 8 页。

推动和谐侨社建设。[①] 文化部也积极支持华侨农场文化建设,明确要求利用华侨农场特有的地缘优势,充分发挥当地侨乡文化特色,推动华侨农场有关文艺团体参加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②] 在中央政策的带动下,一些地方建立了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市县将华侨农场纳入当地文化建设规划,逐年增加华侨农场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为侨场文化建设工作有序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此外,各侨场还建设了一批文化服务配套设施,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室、文化站等,鼓励场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些宽松的外部环境为归难侨们提供了寻求文化自信的机会,他们通过曾经熟悉的舞蹈、美食等异域产品,在当地文化建设中独具特色,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和社会关注度。

随着“印尼村”名气增大,一些媒体和官方开始渲染报道。当发现模仿在印尼的习俗能够成为某种标签,并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时,归难侨们开始主动搜罗和复制在印尼生活的方方面面,顺势而为,尤其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外亲朋好友纷纷来访,印尼村的村民们再次出国去印尼体验,丰了中印尼文化交流的内涵和形式。久而久之,“印尼村”的概念在当地人头脑中也就顺理成章了。

五、“印尼村”带来的一些思考

(一)文化多元和时代选择的结果

“印尼村”里的归难侨和周边村民,在族群概念方面是没有不同的,他们都属于中华民族或者说是中国人,在身体特征和民族观念等方面符合通常的中国人标准;另一方面,他们与周边村民刻意表现出来的不同也不能用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划分标准来界定,这既不符合官方界定也缺少历史和文化基础,这样一种文化夹层现象,是全球化移民背景下文化多元的反应,更是归难侨们在两种文化之间穿梭过程中自身选择的结果。归难侨是在东南亚诸国排华过程中被迫回到中国内地的,当他们回来后却发现融入新生活很困难,周围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很多人早已不会种植农作物,那些在国外已经适应的异域习俗成为他们寻求心理慰藉和群体认同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很像他们的祖辈在早年出国后选择定居唐人街的做法,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只是这一次出场的背景换成了他们的祖籍国。

(二)群体利益驱动的文化标签

用华侨农场方式大规模集中安置归难侨,是中国在困难时期的特殊安排,高效快速地解决了因排华带来的大量归难侨问题,但集中安置也衍生出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与周边社会脱节的问题,安置在农场的归难侨,其祖籍地或故乡大多不在本地,在宗亲、方言等方面与周边社会脱节,农场的归难侨们很难和周边的村民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华侨农场以外的当地人仍然是把归侨当成外国人,甚至一些管辖农场的当地干部也持有这样的看法。”[③]此外,归难侨们身上相对开放的思维方式、异域着装风格等让当时周边相对落后的村民们难以接受,加上土地界限争议等事关经济利益的争夺,农场的归难侨不愿意在农场周边的传统社会中寻求慰藉,因此,农场周边村落的各种习俗很难传递到归难侨当中。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族群划分的标准是文化差异和归属性,有时暗含着社会分隔、

---

① 2012 年 7 月,国务院侨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十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工作的意见》,国侨发(2012)6 号。

② 《侨法工作简报》第五期(总第 201 期),2009 年 3 月。

③ 张晶盈:《华侨农场归侨的认同困惑与政府的归难侨安置政策》,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 年第 1 期。

语言不同以及自发而有组织的排他性。[①] 一些“侨”的特点非常不明显的华侨农场,会在围墙上画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景观,以此证明他们的“侨”的色彩。在印尼村,归难侨和周边村民都属同一族群,印尼村的归难侨想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群体属性,标榜与周边村民不一样的特征,这种差异和排他性必须是别人难以模仿而自己又善于操作的行为,曾经熟悉的印尼饮食和舞蹈等具有鲜明的族群特色,因此“印尼村”这个外来标签无疑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三)不能上升到族群认同高度

当然,“印尼村”的归难侨和周边的村民在族群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不同更多体现在一些外在的明显的符号和标志,比如饮食、舞蹈、服饰以及日常用语等,这些不同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缺少“根”的滋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淡化、消退,为了维持这种不同于周边村民的存在感,需要不断地提醒和强化,因此这种再适应也需要一些外在力量的推动。

此外,华侨农场的“印尼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印尼人聚集的村落,印尼风情更多体现为一种外在表现,归难侨们在内心深处更认可自己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毕竟生理特征、宗族谱系、宗法信仰和价值观念等一些维持族群本质属性的因素是难以改变的,人的血缘和族谱是原生性的、基础性的,根植于无法改变的出生环境,是不同族群存在的根本。[②] 同时,印尼华人重视中华传统价值观念,认为这有利于华人在印尼生存并取得成功,因此将这些观念传承给下一代。[③] 华侨农场的归难侨是因为排华被迫返回祖籍国的,他们没有必要颠覆自己的出身,对侨居地文化的记忆再现是某种怀旧情结,难以上升到族群性特征的高度。

Abstract “Yin ni-cun” is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that gathers Indonesian diet, dance, architecture, etc. Thes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emphasize the cultural memory of residing outside of China and formalized the situation of settlements cultur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hometown. The outside cultural adaption is a topic derived from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spring tid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is phenomenon in which returnees display a reversal to a foreign culture is the result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pochal selection. It has become a special label for the cultu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胡修雷,助理研究员,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黄凌翅〕

①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p. 11.

② S. Cornell and D. Hartman,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1998, p. 48.

③ 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12 页。